

董楚青

忆

我的爸爸董必武

花城出版社

忆我的爸爸董必武

董 楚 青

花 城 出 版 社

（此处为出版信息，如ISBN、定价等）

忆我的爸爸董必武

董 楚 青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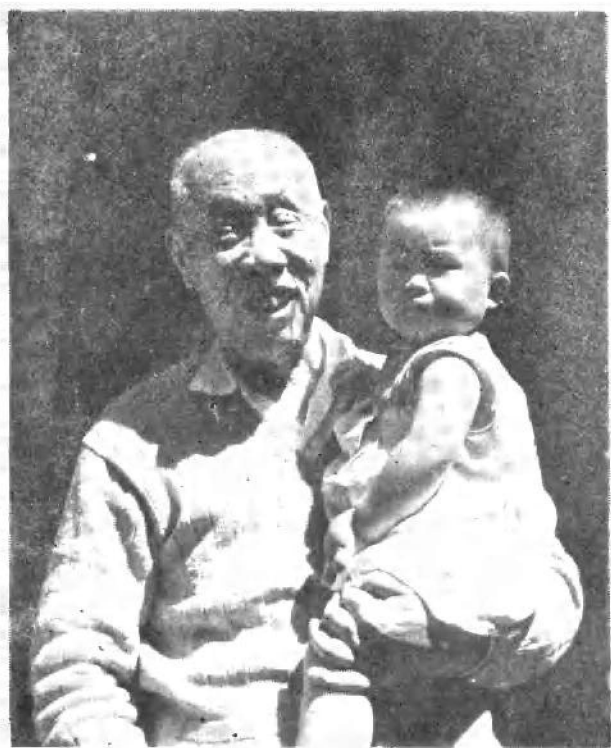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75印张 4插图 110,000字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500册

书号 10261·196 定价 0.68元



董老和外孙女（1969年秋在北京）



董老和夫人
何芝莲（1966
年春在北京中
南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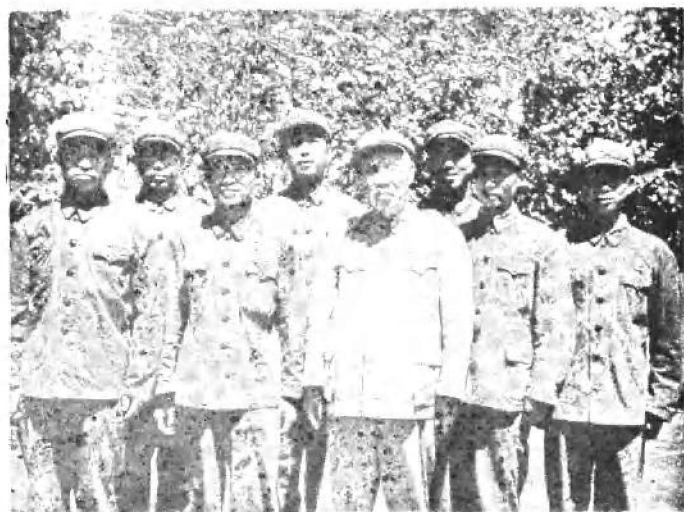
董老和女儿、
儿子在一起
（1950年春在
北京）



董老为红岩
村题诗（1958
年冬）



董老与外孙
女一九七三年
夏在北京



董老和警卫战士在一起（1969年秋）



董老一九七〇
年春在广州市
东山



董老夫妇和孙子孙女们在一起（1974年春在北京）



董老和夫人、子女在一起（1968年春在从化温泉）

开 头 语

我的爸爸董必武去世后不久，许多人来看望妈妈和我们，表示了对我爸爸的深情怀念和敬意之后，还希望我们写点什么，介绍爸爸的生平事迹。把对我爸爸的怀念写成文章，这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前是决不可能的。尽管我和哥哥良羽、弟弟良翮都有写一写爸爸的愿望，但那时也仅仅是愿望而已。

我曾想过，把我所知道的爸爸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一些侧面记下来，包括那些看来很琐碎的，然而却是真实的一些事。我自信可以通过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尽可能如实地记下一个老共产党人、我的父亲董必武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一些侧面。这个萦绕于心头的愿望，在打倒“四人帮”以后，一直在强烈地冲击着我。我也曾陆续写出发表过几篇零星的回忆爸爸的文章和读爸爸诗词的随笔。一些人读过后，表示有些遗憾，托人转告我说：“文章里没有写出路线斗争，

没有反映出重大问题。写得不深刻。”这些批评意见，我不能说不对。但我所知道的爸爸的一些事情的确十分普通，我的写作水平又不高，我怎样能写出路线斗争？写得深刻呢？我只好搁笔。

事有凑巧。这次我从北京南行，到江苏参加一次文学丛刊编辑座谈会，遇到与会的广州《随笔》的编辑，他鼓励、帮助、支持我，一定要好好写一写爸爸。他说：“小董，你就写一写董老的日常生活，写他老人家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音容笑貌，待人处事；写你自己知道的有关董老的一切事和物吧。”这正符合我的心愿，我便贸然答应了下来，就开始写了。

铺开稿纸，我又不免忐忑不安：面对纷纷杂杂的一切往事，我得理出个头绪来呀！从哪儿先扯出一条线来呢？这条线能勾画得出我心中的爸爸的样子吗？

我想着想着，又有点不自信了，但“试试写一写吧”的念头鼓舞着我。就在我们座谈会开会期间，开始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讯，这是一桩意义深远、激奋人心的历史性事件。回忆就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记下我对爸爸的怀念吧。

董楚青

目 录

开头语	1
一、一个突然打来的电话	1
二、迁进与搬出中南海	7
三、弟弟第二次被捕	16
四、相册的劫难	24
五、对小孙女的爱与弟弟下乡	28
六、一张收据	37
七、我的名字的来由	41
八、爸爸的拐杖	47
九、鸡蛋饭和家乡菜	52
十、从报考武普通学堂到学做诗	57
十一、一场足球赛	62
十二、爸爸的轮椅	66
十三、同志和朋友	69
十四、童年一事	76
十五、“保密”	79

十六、“你真的考过秀才吗？”	85
十七、“锄禾日当午”诗解	91
十八、爸爸填词和写诗	98
十九、读爸爸诗想到的	102
二十、书和印章	109
二十一、爸爸的文房四宝	115
二十二、看戏	120
二十三、随妈妈回川	127
二十四、我回爸爸老家看家谱	133
二十五、我的婶婶	136
二十六、我的姑妈	140
二十七、听来的故事	147
二十八、破布·龙套·边鼓	152
二十九、散步的乐趣	159
三十、在病中	167
三十一、爸爸惦记的人	173
写在后面	179

一、一个突然打来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初夏，掀开了中华民族十年灾难史的一页。哪一个人，包括大陆上所有普普通通的人，谁能幸免于难呢？按理，我的八十高龄的爸爸已经多年不从事具体工作了，对那伙权欲熏心的人来说也没有打倒的价值了。可是，林彪、江青一伙还是不打算放过他。我想，仅这一点，除了恰恰说明爸爸与人民，与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共命运以外，还说明林彪、江青一伙反对并与之争斗的不仅仅是党和国家的一批领导人。他们这伙野心家、阴谋家仇视和与之争斗的是一代政权，一种思想，一个数百万人人为之牺牲、奋斗了几十年，今天已为亿万人民所追求、向往的理想。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突然接到妈妈从他们的休养地广州打来的长途电话。妈妈说，爸爸刚接到中央通知，要他的小儿子去投案、自首。没有人向他解释为什么，爸爸也没有问为什么。妈妈在电话中微微有点口吃，嘱

咐我们说：“一定要听话，去吧。”

我满腹糊涂，弟弟本人也不比我清醒！然而，我们要听爸爸妈妈打来的电话通知，还是老实地按中央的指示去办。

第二天早上，我和弟弟骑着车，也没有带牙具、衣物，出了中南海的西门，直奔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东侧的公安部。在公安部熙熙攘攘的大门口，我们找来找去找不到谈话的人。弟弟提醒说，“到市公安局那边去看看吧。”

我们顺着公安部西边院墙绕到它的后边，这里座落着北京市公安局的楼房。一大群正在高呼砸烂公检法的学生扯着嗓门，推推搡搡地挤满了公安局不大的、朝北临街的大门口。公安战士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迎着唾沫四溅的侮辱和不时打在脸上、身上握有小红书的拳头。我和弟弟跻身其中，也许因为我和弟弟与那些狂热者的精神状态不同，倒格外引起别人的注意。一位身穿干警服装的同志挤过来，审视着我和弟弟，轻声地问：“你们怎么也来了？”接着他解释说，他原是中南海的警卫战士，转业到了公安局。我说：“中央叫我弟弟来投案。”他吃惊地看了我弟弟一眼。弟弟朝他肯定地点点头。他问：“你们家搬了吗？”我一下悟出了他话里的实际意思是：“你爸爸打倒了吗？”我和弟弟相视一笑，说：“没搬。”他还不放心，又问我和弟弟：“电话撤了吗？”他这话的意思是在问：“你爸爸受处分了吗？”我和弟弟说：“没撤。”看来他仍然不放心，以致怀疑要我弟弟来投案和自首是否听错了。又问：“你们为什么来的？”我们只好把妈妈打来的电话内容再重复一

遍。他犹豫了一下，说：“你们等一等，我去找个人。”不一会儿，一个四十多岁、中等个头的男同志，拿着一个十六开大小的公文夹子来了，领着我和弟弟挤过人墙，进入一间空空荡荡、看去很大的屋子，屋里沿着墙角摆了一圈长条凳。他让我和弟弟在一条长凳子上坐下，他自己拉过一张旧方凳坐在我和弟弟面前，打开夹子，严肃地说：“谈问题吧！”我弟弟微仰着头，一边回忆，一边检讨自己自“文化革命”以来的违法行为：参加了由派出所提供线索、某军队提供了汽车、公安部派出人员保卫革命小将的打击流氓活动；参与了在中央文革指点下的“毛泽东红卫兵”抄砸民主党派办公室的行动……

北京市公安局的那位同志最初努力地认真地记笔记，慢慢住了笔，后来合上本子，语调中掩饰不住有些生气：“就这些？”我看了看弟弟，弟弟揉搓着帽子，坦率地说：“就这些。”那位同志大惑不解，问：“谁让你们来的？”我们又把投案过程讲了一遍。他认真地听，看样子也认真地想，我感到他不相信这类似天方夜谭式的事实，甚至他流露出完全不相信我们的情绪，他站了起来，说：“好吧，就这样，你们回去吧！我核实一下再说。”我和弟弟刚刚站起来，他那已背过去的身子又突然调过来，面对我们，脸色严肃地问：“你们家电话号码没变吧？”我和弟弟心领神会地明白他对电话的关心，肯定地答复他说：“没变。”

也许我们的坦率、真诚，使公安局这位同志对他本来就无法理解的现实更加不理解了，他的目光流露出无可奈何与

莫名其妙的神情。他摆脱审问的官腔，对我和弟弟说：“你们回去吧！万一有什么，我们会打电话通知的。”稍稍顿了一下，关切地补充说：“别乱跑。”他把我们送出了公安局，回身消失在塞满拥挤、吵闹的人群的门洞里。

我们一回到家里，立刻打长途电话给妈妈，告诉她全部情况。妈妈感到欣慰，连声说：“好嘛。”但当天晚上，爸爸又托秘书打来了长途电话，再次催促弟弟去投案。我们又把去北京市公安局的情况详细地陈述了一遍，秘书即告诉我们：把投案的过程，报告总理值班室备案。第二天上午，我们通过爸爸办公室的秘书丁云泉同志打电话向总理值班室备了案。

我原以为这一切都是误会。然而，不！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凌晨，北京市公安局打来电话，通知我弟弟立即带牙具去投案报到。

当时才二十一岁的弟弟，就这样开始了他第一次的囚徒生活……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九六六年夏天——那时我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一个蒙蒙细雨的晚上，听说清华大学有中央首长前来讲课。谁来讲课呢？我也不知道，匆匆忙忙地赶到清华大学的大操场。我到得晚，只能站在主席台后边的外圈。大会已经开过一会儿了，已有一些人讲了话。我到达会场时，正好听见浓重的湖北口音，啊！这是爸爸在讲话。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爸爸在大会上讲话。

爸爸讲得比较慢，一句话讲完了，总要稍稍停一下，好象在思考似的。他讲话没有口头语，也极少语气词，几乎不

在词语上重复。整个讲话没有跌宕的语调、情绪，显得平淡。

因为是第一次听爸爸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我也感到新鲜，听后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清楚地记得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个新事物，在新事物面前要加强学习，通过学习和实践去认识它，并改造自己的思想。”

他还说，他八十岁了，在旧社会生活了五、六十年，思想上多少有些旧思想、旧意识啊！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经常地影响他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影响他处理问题。所以，他对任何问题在头脑中的第一个反应，总不急于去肯定或否定，而是经过反复调查、思考之后才表示态度，这样对问题的认识和处理就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最后，他表示说，“要和小将们一起学习，一起革命。”

爸爸这番讲话，当时没有引起与会学生们的反感，当然也无多大明显的好感。那时，我对爸爸的讲话也不是很赞同，感到他讲得“没劲”，缺乏“革命”的时代感。因为一九六六年，在我们这些学生心目中崇尚的所谓的革命口号是：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呀！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于爸爸的讲话的理解在逐渐加深。后来我才认为他讲话中所提倡的是对的。也许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提倡学习的，还是我的爸爸哩。

历史终于证明，爸爸是对的。反证则是我的弟弟。他的革命热情没有扎实的理论指导，就一度成了林彪、江青一伙